

与众多东来的至交相比，我与他的关系说不上很近。上个世纪30年代温源宁用英文写过一本记人的书，书名是“Imperfect Understanding”，译为《一知半解》，温的学生钱钟书将之译为《不够知己》，至今这本书就有两个中文书名，两个译本。我与他的关系大约就是这样。我们的“不够知己”还有个例证。有一次他为我的书写了书评，在《博览群书》上发表时把我的名字写错了。事后，东来也发现了这个错误，说是别人一定会就此认为我们的关系不算铁。我则认为，我们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我与东来还是很谈得来的。

东来已往生天国，我们活着的人想起他来多有不舍之意，闭上眼他又活灵活现就在眼前，宛然如生。回忆他先从表象入手。首先他就胜在一个象上。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仪表堂堂，有着帅哥的气派，样子还显得特别年轻。在外人眼里，与女儿并列，他像个哥哥；对夫人而言，他又如同大儿子。他们一家三口出行，有人会恭维他夫人儿女双全。加之东来脸上总挂着谦和的招牌微笑，那种风度真应了一句旧语：混沌尘世之翩翩佳公子，磊落俊朗。

再透过表象深及内里，东来内里的学问也极好。他终生酷爱学术，说他一生以学术为志业并非虚言。孔子有句名言，讲的是治学，“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意思是古人治学为的是对自己有益，而今人则带作秀炫学的成分，是做给人看的。而东来的治学偏向的是这句名言所说的“古之学者”。

以东来的著作《美国宪法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为例。这本书我细读过，觉得无论是内容还是表述都为上乘，反响也是好评如潮，推想以后一直会有人读，从中获益。而现在有不少的“学术”著作则是方生即死，与草木同腐。两者相比，真有天渊之别。尽管从世俗的眼看，东来获得的课题、奖励并不多，但人们心中另有一杆秤，将他称得很重。

最后由人及己，谈两件东来对我个人的帮助的故事。

一是编书之助。十多年前，我想编一本有关宣传海报的小书，书中要搜集100幅外国宣传海报进行解读。编到最后时就缺几幅，遍寻无着，后来在东来的藏书中找到了。如同我造高台，他添了最后一块砖。

另一是他为我写书评。我编了一些花花绿绿的图画书，都不是高头讲章的堂皇之作，送给东来供他休闲时养眼，或是让他女儿有兴趣时翻翻。未料到东来不仅认真看了，还主动为我写了两篇书评，给予好的评价，甚至认为图册的精美不输于舶来品，鼓动了他的民族自豪感。现今有不少书评是作者的请托之作，而他却不受托也写，对我的鼓励是永远难忘的。

逝者长已矣，生者当永怀。或许，我们这些生者像他那样坦诚、真实地做人、做事，是对他最好的怀念。

东来西去

孙江林

任东来教授驾鹤西去。52岁。时间是，2013年5月2日18时47分。5月4日上午9点，在南京殡仪馆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三月中旬的一天，中美中心的黄成凤主任打电话给我，说任东来的癌细胞已经扩散，时日不多，医生建议准备后事，家属把坟地都买好了。她问我高华的后事系里是怎么办的。东来生病是去年的事，当时听说状态不好，没有想到情况会这么差。第二天下午，我与谦平主任到军区总院看过他一次。东来的女儿在国外留学，专门回来照顾东来。东来见我们来了，很激动，谈话是坐着的，声音与平时差不多，只是时有颤抖征象。谈话间，东来还关心女儿的学业。女儿在一边微笑着说，学业已经完成。我想，东来的女儿肯定知道东来的病情，才20出头的年纪，要做出这样的微笑，内心要有怎样的挣扎！没有想到的是，还不到两个月，东来就走了。东来的去世，是学界的一大损失，当然更是历史系的一大损失。我为南京大学历史系继高华之后，又失去这样一位严谨务实、积极进取、成就非凡的学者而深感痛心。

我与东来以前并不熟，07年，我回历史系工作，才知道东来是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的博士生导师，平时不多见，新年聚餐才见到他，知道他执教于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学问做得很好。后来到系里活动室打过一次乒乓球。球打得不错，但活动之后，有点喘息，是不常锻炼的那种，似乎平时的工作和研究很忙。

后来，我读杨守建写的《中国学术腐败批判》一书，注意到书中引用到东来的治学观点，语气充满对东来的敬重和赞同，这让我心中充满自豪感，同时也与我时常跳跃在脑海中的一个思考相契合，譬如，文科的学术研究，热火朝天，期刊众多，待铅华洗净，50年后，有多少文章和著作能经得起时间的洗礼，能真正流传下去？

杨守建引用东来的话，是为了批判学术研究中的“借腹生子”与“借鸡下蛋”现象。杨著说：学术著作袭蹈前人，互相“借鉴”是个老问题，任东来先生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也需要为学问而学问的学者》中就讲了这个问题，在文中他说：“在今天的书店，到处可见泛泛而论追求时尚却无多少新意的‘学术著作’……笔者翻阅了许多种部头不可谓不大，均为几十万字的，名称不可谓不响，皆为‘××学’、‘××史’、‘××论’的著作，但几乎看不出有一本有何突出贡献。意味深长的是这些学者们很少注明他们所依据的材料出处，更不具参考书目，似乎这洋洋洒洒的大作无一字不是他们天才的创造。但当你把这些同类性质著作对照时，西洋镜就被捅破了。原来这是一种你抄我、我抄你、大家抄国外、一起抄马列的‘学术’。这种学术加上一大批‘写’出几本著作的‘学者’，并由此形成的某种‘学术繁荣’，实

在值得知识界反省一下了。”

杨守建的《中国学术腐败批判》，我是细心阅读的，书中列举的例子很多，观点我非常赞同，但就目前的状况来看，要完全克服，实属不易。因为中国的学者除了为学问而学问，还需要为生活而学问。许多评价机制，使有些人不得不打擦边球，否则你就会掉队，生活质量也会跟着落伍。就像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施密德特说过的：“中国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真正属于自己意义上的事业。”这话有些偏颇，但折射出某一个外国大学校长眼里的中国学者的生存景象。话再反过来，如果在制度设计上，不量化要求，不予以督促，确实有人会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但不论有无制度的约束与激励，东来是本着自己的学术良知而始终奋力前行的一位学者，所以他的文章著作，不仅发表档次高，成果丰硕，而且不夹“黑心棉”，因而受到学界的普遍好评。东来是为学问而学问的一名学者。

当然真正要做出好学问，还是很辛苦的。高华去世时 57 岁，东来才 52 岁。他们的仙逝虽说有自身客观的原因，但他们对自己要求过高，压力太大，是不是也是原因之一？我不得而知。只希望学者朋友们不要太辛苦，既要做一名为学问而学问的学者，也要量力而行。

东来西去——怀念杰出的任东来教授

庞中英

昨天在北京听闻南京大学著名学者任东来教授英年早逝，我感到十分震惊、惋惜和难过。

记不得是何时认识东来兄的，但我们的相识一定是因为文章。2004-2005 年，我获得机会到东来所在的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研究中心成立不久的国际问题研究所做“住所研究”。那是一段愉快的时光，研究条件好极了，我有时间专门思考美国，补上我的美国研究。

在南大中美中心期间，我多次与东来一起在中心的餐厅吃饭和交谈，也去过几次东来在中心的研究室。他的办公室还算有空间，藏书丰富，有些凌乱，但是，这才是真正的大学者实现使命的场所。当时，如同国内大多数同行，并无独立的办公室，于是我表达了由衷的羡慕南大中美中心教授的工作环境。

记得有一次是南京大学的石斌教授宴请我，东来自然也来，他谈笑风生。东来是好父亲。我还记得搭乘过他的车。他告诉我，他开车主要是用来接送女儿上学的。

2008 年快岁末的时候，应中美中心之邀，我返回中心做了一个讲座。讲座前，中心主任

黄成凤教授和副主任蔡佳禾教授与东来一道请我午餐。在他们引导下，我兴致勃勃地参观了中心刚启用不久的新建筑，包括新的图书馆，并有机会在中心新的客房短暂午休，以为体验和回忆。那应该是我与东来最后一次见面。

印象中，他的身体很好，却惨遭如此不治之症。东来智慧早熟，学成较早，将近 30 年的学问教学生涯，足迹全球，对中华的世界史学（美国史）、国际关系理论、法学等的发展均有大的贡献。

东来有着世界历史学家和国际问题专家的敏锐。如今搜索网络，我意外发现东来竟然把我们之间的一次随意的谈话，引用在他的著作中（见：<http://www.cssm.gov.cn/view.php?id=8326>）。

东来已经西去，作为他的学友，我记录上述与他交往的点滴，算是对东来的怀念。

任老师，一路走好

赵娟

金陵五月，草长莺飞，原是万物繁盛的时节，我们却要送别任东来老师，上天真是残忍，不是说“大德曰生”吗？此时此地，何以这般无情？！

任老师是我景仰和尊重的师长。十多年前，我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他已经是美国史领域的知名专家。后来我供职于南大法学院，与任老师在美国宪法研究方面有不少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时有交流。对于我这个学术上的后生，他一直给予关怀和照拂。每每想起他的恩惠，我的心中总是充满感激，也为自己始终无以回报而惭愧。

最难忘 2008 年。年初大雪，气温骤降。就是那样一个寒冷的冬日上午，任老师站在他家小区的大门口等我，他为我写好了申请 FFP 项目的英文推荐信。当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他面前时，首先看到了他微笑的目光，他简单询问了关于申请的基本情况，对我说：你要有信心。那一刻，我十分感动。我这个无名无望的小教授，平日里见多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面对这样的鼓励和帮助，很难不动容。我知道，我是幸运的：在这个虚夸、浮躁的世界上，仍然还有人如此真诚地做人做事。这些年来，任老师伫立在风雪中的形象，成为我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成为我学作人师、学做学问的榜样。

任老师离开了我们。四季变化之于他，已不再有意义。我相信，他摆脱了沉重的肉身和尘世的牵绊，灵魂在天国得享自由与安宁。生命起于偶然，却难逃必然的归宿，这或许是人作为人的无奈。但是，只要曾经留下温暖和光明，人生的价值就是永恒的。任老师的人生即

是如此！

任老师，一路走好。

2013-5-3

回归“本真的自由”——东来老师头七祭

佚名

得知东来老师溘然辞世的消息是在上周四晚九点半。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喧嚣繁闹的教学楼早已陷入晚间的沉寂。与学生道别后，我转身走向电梯口。此时，手机短信突然响起。平日里习以为常的声音在那晚却足以划破凄清的夜空。刹那间我心中一沉，下意识地瞥了一眼，不禁黯然神伤，最不愿发生的终究还是来了。

我与东来老师相交不多，但却记忆深刻。2010年春，我刚从美国回来，着手准备毕业论文。因为赛珍珠与中国抗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便试着打电话请教这位以研究中美关系史出身的权威专家。电话那头的他声音略显疲惫与倦怠（后来我才知道是重感冒的缘故），但即便如此，我能真切地感受到从一个学者内心深处所迸发出的学术激情。十分钟的通话意犹未尽，我便借此邀他出来详聊。东来老师欣然应允，于是我们有了中美中心春假期间的第一次相见。

东来老师的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学者气质，和当今功利之心与浮躁之气盛行的学术界格格不入。既不市侩，也不清高，他像一个永远也长不大的小孩，回归了本真的自由，无拘无束、无怨无悔地徜徉在他梦想的学术殿堂。

第二次与东来老师打交道是在手头的教材即将付梓之际。作为主体部分的英文请外教润色之后，我对大量的中文注释，特别是涉及到美国宪法和政治制度的内容仍然感到惶恐不安，毕竟这是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核心所在。于是东来老师又一次成为我求助的对象。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就将修改后的书稿转发给我，指出错误的同时也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不久，他又应邀作序，文笔之流畅，思维之敏捷，跃然纸上。

出于真挚的感谢，我和爱人请东来吴耘两位老师出来吃饭。席间，他那爽朗的笑声又一次深深感染了我。我清晰地记得，红烧肉是他的最爱。但因为尊重女儿的饮食习惯，家里却很少吃。父爱如山，沉稳而又内敛。

和东来老师的最后一次相见是在去年冬天。新家装修好之后，英式田园风扑面而来。晚餐聊天时，我问起琬洁的学习生活，东来老师却自告奋勇地抢先描述，那场景令人忍俊不禁。

万万没有想到，仅仅一年多的时间，我与东来老师竟然阴阳相隔。在他病重期间，我体谅吴耘老师的苦心，一直未曾到医院探望，现在想来确实是无法弥补的遗憾。

人生无常，世事难料。东来老师的质朴和纯真让我久久难以释怀！

泪眼婆娑中，再道一声：东来老师，一路走好！

记与任东来先生的最后一面

闵凡祥

任东来先生走了，年仅 52 岁。就年龄而言，算不上高寿。但就其社会、学术、人生影响而言，恐无几高寿者能及。他不仅将永远活在他的亲人、师友、学生心中，而且还将永远活在每一个真正的学人心中，见过面的与没见过面的。

我到南京大学读世界史硕士研究生时，任先生尚在国际关系史专业带研究生，所以没有上过他的课，最初对他的了解大多来自与国际关系史专业同级研究生同学的闲谈。从他的学生刘君那里知道任先生是一位非常好的老师。从马骏那里知道一些任先生的学术旨趣。有一次，马骏说任老师在课上推荐了一本非常好的书——博西格诺等著的《法律之门》，他当时正在读。于是我也急忙跑到书店买了一本，但只是未能坚持读完。在自南京大学小百合历史系版上读到任先生仙逝的消息后，我回身扫描书架，再次看到了那本虽已购买 10 余年，但却一直没读完的《法律之门》。我想，该找个时间，把这本任先生推荐的书好好再读一遍了！

我第一次见到任先生本人，是在一次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的答辩会上（应是 1999 年 6 月份），当时他被邀做答辩委员。当时对任先生的印象是：此人博学多闻、思维敏捷、言语犀利。自此之后，同任先生的见面逐渐增多，但也多是在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会上。每次听任先生评论答辩人的论文，都感觉颇有启发与收获。

等我博士毕业留校工作时，任先生已是世界史专业的博导了。能同任先生这样的学者同事，真是我等学术后辈的福气。因同在一个学科的缘故，同任先生见面的机会亦即不再仅限于毕业生的答辩会上了，学科开会与聚餐时，都可以见面。有任先生在场的聚餐，总是一场收获双倍的用餐，不仅能吃到有油水的饭菜，最重要的是还能从任先生的高谈阔论中享受到难得的精神美食。

后来任先生到美国访学，大约有半年未见。再后来即听陈晓律老师说任先生生病了，到北京治疗去了。刚听到此消息时，尚觉得问题可能不会太严重，或许过一段时间任先生即可重新回到大家身边一起工作了。但此后的消息却是一个比一个坏。

今年4月16日上午，到校医院参加一年一次的教工体检，刚进校医院大厅即遇到陈晓律老师。寒暄几句后，陈老师即告诉我说，“我刚到楼上看了一下东来，情况不大好，北京和南京的几家大医院都拒收了”。听此，我一下子没明白过来。我问“不是一直在北京治疗吗？怎么会在校医院呢？校医院能治这样的病吗？”陈老师没有直接回答，只是叹气说“大家好好保重吧！”于是我提出说“我想等体检完了上去看看他，不知是否可以。听说他不愿意别人探视”。陈老师说“可以！没问题！在28床”。

至11点10分的样子，我做完了所有的体检项目。然后即快速至汉口路上的一家水果店挑了几样新鲜水果，让老板用果篮包了，提着折回校医院，至在2楼的住院部。在护士站得到一位护士的指引，我很快即来到28床的病房门前。但至门前时，我犹豫了。我能进去吗？因为门上有一张打印在A4纸上的友情提示“保持安静，拒绝探视”。犹豫再三后，我还是决定进去，心想哪怕只是看任先生一眼即离开也是好的。敲门获允后，我推门进屋，任先生的妻子吴耘教授和两位老人（可能是吴教授的父母或任先生的父母）在屋。因屋内光线较暗，加之任先生躺在床上被子盖至下颚，我下意识问了一句“这是任老师的病房吗？”吴教授和两位老人起身相迎，问“你是……？”此时任先生用虚弱的声音说“我们学科的闵老师”。此时任先生的女公子琬洁推门进来，高兴地说“老爸，你很快即可到鼓楼医院和……做邻居了。……也在肿瘤病区，你将住他（她）隔壁……”任先生听后轻声说“这是世界史学科的闵叔叔”。琬洁礼貌地对我说“闵叔叔好！”之后她即带两位老人去吃午饭。

吴耘教授抱歉说她因前些日骶骨受伤不能陪我坐着，需要斜躺在床上。在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任先生的病情后，吴教授即坦诚地说“闵老师，真是不好意思。任老师最近一直很虚弱，需要休息，就不多留您了。谢谢你来看他！”我即起身说“任老师，您好好休息，待过几天再来看您。吴老师，您也要注意休息，保重身体”，然后告辞。除前面说得两句话外，任先生都没再做声，好像睡着了。

这是我同任先生的最后一面。不想他这么快就走了！

任先生离开我们5天了，想必他早已在如图书馆一般的天堂中安排妥当，开始一个书生的天堂生活了。愿任先生在天堂一切都好！

吴教授和任琬洁学妹节哀顺变，早日从丧夫丧父之痛中走出！因为如琬洁学妹所言“父亲是给我们带来阳光的人”。我想此时此刻，任先生在如图书馆一般的天堂中正微笑着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人，为她们祝福，希望他们笑呢！

谨以此悼念我敬重的学者任东来先生！

写于2013年5月7日夜深人静时

任东来教授与格林奈尔大学

冯 进

2013年5月3日一早，我刚打开伊妹儿，就收到美国同事转发来、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联合创办的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讣告：中美外交关系专家、历史学家、博士生导师任东来教授于2013年5月2日下午六时许在南京因病逝世。

任老师出生于1961年，是南大－霍普金斯中美中心的首批毕业生之一。1988年他从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成为建国以来内地第一位美国史博士，以后长期在中美中心任教。任老师不光在历史学领域著作等身，和我任职的美国格林奈尔大学（Grinnell College）也颇有渊源。根据南大和我校的交流协议，2005－2006学年他的夫人吴耘老师来我系教授汉语。任老师作为福布莱特学者，在附近的德莱克大学从事美国宪法方面的研究。他们举家搬来，在我校所在的小镇落脚，女儿则在小镇中学读书。我也得以和他们一家结缘。

虽然我们的专业领域不同，任老师来我校以前，他的大名我早已如雷贯耳。他的学术研究众人交口称赞，他的鲜明个性也催化了很多传奇故事。那年有幸常见面，我对任老师的性格、为人更有了第一手了解。他们的女儿曾笑称，家里的领导是妈妈，她和爸爸是下级。吴老师是三人中操持家务、管理家事的决策者。她总觉得任老师“很傻很天真”，平日只知埋头学问，不通人情世故，口无遮拦，易得罪人。譬如，某次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到南大演讲，正式发言完毕，任老师当仁不让地率先发问。在场的同事都暗中捏了一把汗，深怕这位平日就以直爽著称的同事引发什么“外交危机”，因为其他提问者都事先接受任务、经过充分准备，只有他才是真正的自由提问。

来我校访问的中国学者，有的不习惯小镇的安静偏僻，诧异美国怎么会有这样和纽约、旧金山迥然相异的“穷乡僻壤”。他们一家却是适应新生活、享受新生活的代表。任老师兴趣广泛，对生活充满好奇和热情。他到美国后很快考到驾照，买了一辆二手车，周末经常载着一家三口去附近的自然公园休闲，扑去六十英里外的大购物中心“血拼”，也常光顾体现本地农业州特色的集市、博物馆。

任老师夫妇在教学中强调“赏识教育”，对女儿也如是，就是批评孩子，也尽量不损伤她的自尊心。为了鼓励女儿做家务，他们实行“物质刺激”，每次洗碗奖励两美元。本地中学为了培养“企业家”，帮助学生开个小文具店，学生自己经营。拿着两美元，女儿可以买些漂亮的本子等纪念品，所以对做家务非常积极。发展到后来，其他同事需要遛狗、照看小孩，也会请他们的女儿帮忙，让她赚到零花钱的同时也受了不少锻炼。

他们的女儿在小镇中学成绩出色，曾以国内初三的程度参加奥数比赛，打败了美国高三

的学生，勇夺冠军。她还热爱网球，参加各种课外活动，交了好些美国朋友。2009年我校秋季开学时，我在新生名单中赫然看到他们女儿的名字，这才知道她就是那年我校在南京选拔出的唯一一位全奖学生。记得当年回国时，父母担心她在美国“放羊一年”，回去能否升入名校高中。从结果来看，美国教育方式似乎也并没有给孩子带来什么无可挽回的损害。

2012年春季学期，任老师作为南大的访问学者，再次来我校访学，他的女儿那时已大学三年级，还有一年就要毕业了。任老师一如既往，学术上精益求精，对生活充满热情。他每天早上去我校体育馆游泳一小时，每周四参加我系教授和学生一起练习中文口语、边吃边聊的午餐会“中文桌子”，席间他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对中美时事和历史沿革如数家珍。每个月他兴致勃勃地亲手做菜，和东亚研究的同事们聚餐。农历春节过后，他还邀请几位中国留学生和来访的南大老师去他住的公寓包饺子、吃饭。只是那个学期他身体不太好，常有感冒、低热症状，当时他自认是之前在国内工作过劳，大病一场还没完全恢复，到美国又适逢寒冬，所以水土不服。

2012年5月回国前，任老师正在筹备国内的一个大型学术会议，他告诉我：已经组织了一批有关专家，正在编辑一套学术书籍。5月底我校新任校长带队去南大签约，任老师和吴老师作为前格林奈尔大学的教授、学生家长还来参加晚宴。他还是那么热情洋溢，充满干劲，说第二天就要离开南京去开会。孰料那日匆匆一别，竟成永诀。

2012年秋季我在国内学术休假，忽然传来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任老师查出淋巴瘤晚期，入院接受手术治疗和化疗。之后，我从美国同事那里陆续听到进一步的消息。2013年春节问候吴老师时，她告诉我任老师在北京接受治疗。到了3月，他们的女儿从我校提前毕业，赶回南京照顾父亲。给吴老师打电话，我才知道她春节大扫除时从桌上摔下，尾椎骨裂，被迫卧床。加上任老师病情加重，已经修完所有学分并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录取的女儿决定提前毕业，回家帮忙照料父母，甚至愿意放弃去哥大读书的机会。我当时还感叹他们教女有方，是不幸中之大幸。没想到两个月不到，就传来任老师往生的噩耗。

任老师的学术成就、道德文章在行内自有公论，毋庸我这个外行赘言。但他生前一言一行展示的批判性思维、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真率热情的人格魅力，让我终身难忘。前些日子前南大教授、历史学家高华病逝，学术界叹惋一片。如今任东来教授又英年早逝，难道真应了拜伦说的“主所爱者易成殇”（Those who God love die young）？

我眼中的任东来

余宁平

我比任东来大几岁。十几年前在西苑工作，带美国留学生的时候认识了他。

任东来的记忆力特别好。2011年我回南京工作后不久，有一次在食堂吃饭碰到，谈起十年前的一些往事，有好多我和先生都不记得了，但他却可以一口气讲出我们与当时在中心教书的几位教授交往的几件往事，连人名都准确无误。经他这么一说，我才回想起当年的这些故事。后来他告诉我，他去美国时，见到我们当年认识的那两位教授，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又回南京了，他们怎么也想不起来我们是谁了。

我和任东来接触不算多，但他的 love of sharing and love of giving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带学生去参观航空烈士纪念馆，听我和同办公室的小施说我们没有去过，就欢迎我们同去。后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去成，他又对我说，要是他的时间允许，愿意带我们的学生去参观，给我们讲这一段历史。

我没有想到，这一次竟然是他和我的最后一次见面。听到他生病的消息，我和先生都很替他担心，因为帮不上忙，也怕给他和家人添乱，真的是干着急。知道黄成凤主任帮他，我们从心底里感谢黄主任为他做的一切。

时至今日，我仍然没有去参观航空烈士纪念馆。我知道不久的将来我会去。我也知道，我去的时候，心里念着的第一个人就是任东来。

2013年5月5日

好人任东来

尹朝安

今天看到《北京青年报》和《京华时报》等报纸报告，南大教授任东来因病逝世，享年52岁，我感到非常惊讶、惋惜和遗憾。因为，我们是1980年代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美国系毕业的校友，他师从美国所的美国历史研究员杨生茂研究员，而我师从美国所的美国经济研究员陈宝森研究员，他是1982年进校，1985年毕业，我是1987年进校，1990年毕业。由于他比我大几岁（几届），先于我进校和毕业，因此，没有机会在学习期间见过面，我不认识他。

1988-1989年我到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学习一年，开学不久，他知道我的来历，期间找到我，希望我写一篇有关我老师陈宝森刚出版的著作《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的评论文章，要求不光是提出积极的评价，赞美之词，而且要客观地指出其存在的不足，提出改进意见或者建议，我才知道他的一些经历和认识他，才知道他是我的“师兄”，应该是学长。由于我刚开始读研二，正在强化英语过程之中，自己的学术能力十分有限，当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评论我的老师的著作，也不敢妄加评论，不得不谢绝了他的好意。但是，他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那一年，他在中美中心教授美国人，不是教我的老师，但是，我们也是成为淡水之交的朋友。

1993年之后，由于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没有留在美国所，不再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而是转行进入了商业领域谋求自己的发展，与东来留在中美中心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人生轨迹发生交集的机会很少，比如有可能的教学话题和参加学术会议等，但是，由于对他一直保留良好的印象，我的记忆里一直与他保持联系。

2007年6月，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庆祝21周年，我自然回去参加了庆典，当然也见到了东来，高兴与之合影。之前应邀写的一篇有关中美中心的回忆文章刊登中美中心的网页和当日的校报上，任东来和其他教职员都给与了很高的评价。

本来，中美中心在2012年6月举办26周年庆典，我是计划回去参加的，可是，由于家里有事，没有时间前去参加。没有想到的是，因此而失去了一次与东来再次见面的机会。今天听到东来病逝的噩耗，我非常惋惜和难过。他这么年轻就去世，多么可惜。对于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盛行的浮躁之风，他没有跟风，而是继续留在南大中美中心，从事主要的教学，但是，他善于独立思考，勤奋，能够静下心来，抽出部分时间用于研究，获得不少的成果。这种品质是难能可贵的。

我想，虽然我不能说和他成为了特别要好的那种无话不谈的铁哥们式的朋友关系或者学术同行，但是，在我的记忆之中，他给我的印象一直都是非常好的，就是温和，谦虚，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容易接触，非常积极，正面；他没有给我留下任何负面、消极的印象，因此，我记得住他。我相信，他是一个好人，因此，我写这个博客来纪念他，永远记住他。

那次我见到你——怀念东来

徐建清 朱网锁

那次我见到你

我们邂逅在古城校园的林荫大道旁

初次相识却似老友重逢

那份爽朗那份坦诚那份温和从此难忘

那次我见到你

我们畅谈在北京西路的那间书斋

那里装满了你的智慧你的思想

孜孜不倦的耕耘永不停息的求索是你的信念

那次我见到你

我们相聚在秦淮河畔温馨的小屋

温柔贤淑的妻子冰雪聪明的女儿

是你停泊的港湾幸福的泉源

那次我见到你

肆虐的病痛将你羁绊在昏黄的病房

但你苍白的脸上写着坚强与不败

身体羸弱却依然牵挂着你的挚爱

那次我见到你

消瘦的身体将你束缚在冰冷的床榻

但你仍以一贯的热忱笑迎我们的到来

全然无视病魔的啃噬和折磨

那次我见到你

安详地憩息在百花丛中

我怅望云天问你可否记得我们的约定

2013年5月11日

于南京丹枫园

如水纯，如松直——悼念恩师任东来教授

邱美荣

2013年5月2日晚，发现手机有未读短信，打开后得知恩师任东来教授已走的噩耗，霎时怔住了。因为曾计划在“五一”再去看恩师，因有事而临时耽搁，计划永远泡汤。霎时，泪奔，心乱如麻，唯3月份临别时他的笑容和惜别的眼神清晰可见，而这亦让我更伤感，因为那时他担心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见面，而我则认为肯定不会，我会再来，他也会再次战胜病魔，再次让病危通知落空。但，计划不如变化，恩师没有再等我去，他走了。回忆有关于他的一切，近日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个习惯。

1996年，我进入南京大学攻读国际关系史硕士学位，有幸师从任老师，也是他所带的第二位国际关系硕士生。自96年相识如今，也有十几个年头。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他的学识和学术，而是他纯净如水、正直如松的个性。毕竟，相较于理性的学术而言，感性的他更让我觉得他的一言一行无处不在，仍然留在我的生活。

恩师是个很纯净的人，像个孩子，没有世俗气，亦像一汪清泓，一眼可以望到底，没有一丝杂质。这一点上，师母吴耘教授与他颇为神似。南京读书三年，在先生身边学习的日子，因而也就成为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先生的纯净，在于他对所有人都好，对我们学生就更好，总是在生活和人生规划上替我们着想，好到不能再好。

记得有一次，先生请他在中美文化中心工作的同事、也是一位美籍教授晚上去家里做客，让我和张振江师兄作陪，先生的用意是锻炼我们的英语口语。毕竟，搞国际关系研究，这是最基本的素养。但那时，我的英语根本开不了口，中国应试英语教育的弊端在从农村走出来的我身上尤为明显。那一晚，我仅仅用英语开口问候了美籍教授，其余的时间都在和先生的女儿琬洁玩，让先生颇为失望，事后还曾专门提及此事，批评我不利用机会好好学习。即使时隔多年，就在今年3月份我去南京军区总院看他，我俩聊天的时候，他对这件事仍然记得非常清楚，可见当时我让他有多失望。

不过，我的表现虽然让先生失望，但失望归失望，那天晚上我穿得比较单薄，先生就让

师母给我找衣服，师母就让我挑了两件大衣，其中一件是先生在香港给她买的、从未穿过的新大衣：时尚的驼色和毛领子，修身的款式，即使放在今日，这件衣服也非常漂亮，可见先生的眼光不赖，当然，这也得归功于师母的“栽培”。先生经常陪师母去购物，师母挑选衣服时候，他坐在一旁看报，如果没有报纸，就拿柜台的广告看。师母说她挑了衣服，要得到先生的赞同与首肯才会买下。但先生常对我夸奖师母的审美眼光，他们家布置得赏心悦目，我问是不是请人设计的，他大笑：“吴老师就是‘设计总监’”。在先生眼里，英语科班出身的师母相对于学历史出身的他来说，“品味”更为高雅些。但不管如何，先生与师母这种共同挑选衣服的习惯，久而久之，让两人的审美眼光更为一致，而先生与师母的感情也就从此件小事上可以窥见一斑。

先生的纯净，还显示在他很耿直，在做人的细节和做学问的原则问题上毫不放松、直言不讳。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先生会布置一些书让我看，有时候会让我写一点东西。相较于我的同学而言，他对我的要求严格些。那时候电脑没有普及，我们的论文都是格子稿纸手写的，我是个较为粗线条的人，大多时候论文写好后比较高兴，所以就没有再看一遍，好像被自己偶尔的灵感冲昏了头脑，也就有了诸多后遗症，包括错别字和段落的分行，惹得先生有些恼火。直到有一次，他发火了。事隔多年，我不记得先生发火的模样，仍然清晰地记得他的话：“老师不是给你改错别字的，论文写完后要自己仔细看。”先生不是轻易发火的人，他一向温文尔雅，估计那次火发得有点大，师母就说他怎么对学生这么凶，他气呼呼地把我的文章给师母看，说，“这家伙，跟她讲了几遍了，就是不听”。

是的，在先生眼里，做学问是要认真的。他最容不得别人糊弄学问，自然他对于学术规范也是极为看重的。记得先生跟我说过，论文注释就相当于做人，是别人的东西不能说是自己的东西；相反，大方承认是转引或者参照别人的东西，会赢得大家的尊重，否则犹如小偷。正因为如此，凡是有他参加的学生论文答辩，他在这些方面的指导和批评也是开门见山、毫不转弯抹角的。在他看来，学术就是学术，对学生论文的把关就是对学生的负责。所以，当时我们历史系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或者开题报告，但凡有先生在，大家都是小心翼翼，但先生则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多年后很多学生回忆起来，仍觉得受益颇多。这么多年来，在做学问方面，我一直遵照任老师的要求，规范行事，不急于发表论文，要发的话，就要努力做到自己满意的状态。现在想想，唯有这一点，我达到了先生所要求的标准，所发的论文，也大多在学界公认的权威期刊。

先生和师母为人纯净，对我批评归批评，但却是爱护有加，这让我呆在他们身边自在舒服，很快乐。先生时不时和师母带上琬洁，请我吃饭，我们就在中美文化中心边上精致的餐馆里用餐。我至今记得那个餐馆的样子，绿色的屋檐，环境幽雅，这是我关于美好生活的最初印象。1997年先生在香港访学，当时刚好是香港回归，他还特意给我寄来两张明信片，为

的是盖上那历史性时刻的戳。可惜，那时候研究生是集体信箱，我并没有收到他寄给我的明信片。

1998年，当时复旦大学中美研究中心办第二届中美暑期安全国际讲习班，先生就让我过来参加，整个讲习班就两个硕士研究生：我和当时在南开大学读书的王学东。那次讲习班是我第一次听全英文的讲座和报告，虽然不能完全听懂，但让我认识了很多学界的知名学者，我后来博士时候的导师倪世雄教授就是在那时候认识的。

这次参加暑期安全讲习班的空闲之余在五角场逛街的时候，我偶然发现一瓶止鼾停，想起了有次听到师母嗔怪先生晚上睡觉打呼噜的事，窃喜，就买了。这瓶止鼾停好像是进口牌子的，价格应该是接近或者等于100元，大约等于当时讲习班发给我的零用钱。回南京后，我好像把它“偷偷”地给了师母，让她转给先生，怕先生知道我获悉他打鼾的“秘密”。师母扑哧笑了：“他这哪是秘密？大家都知道。他有鼻炎”。师母把它交给先生后，先生很认真，把它放在漱口杯旁，每晚在洗脸池边用药漱口，咕噜咕噜地清洗喉咙。那时候年少，没有怀疑过打鼾停的效果，但这份纯真，或许也给先生一丝快乐吧，他才愿意这么认真地对待。

在先生身边学习的三年，先生用他的眼界和视野让我认识学术研究生生活，也唤起我对这种生活的向往，后来我立意去考博做研究，虽然有各种因素，但过着先生一样的学术研究生生活，也是我考博的动力源泉。

毕业后离开南京，跟先生的联系一直没断，他给我的学术帮助也一如既往，对先生和师母的那份感情经岁月之河沉淀在心底。去年得知先生生病的消息，很震惊，也很难过。放寒假的时候想去看先生，先生从医院出来快要过年了，也愿意他合家团聚，不想打扰，直到今年3月份，从师弟胡晓进博士那里获悉先生病重的消息，赶到南京。

我和上外的钱皓老师到达南京军区总院的时候，先生已经被安排在单人病房，医生专门搭了层流床，以防感染，我们就没有进去，担心自己风尘仆仆会把病菌传染给他。站在门口，先生一眼看到我，开心地叫着我的名字。虽然先生很开心，但是医生告诉我们的情况却不容乐观：严重的IV度骨髓抑制和高烧，白细胞低到200，甚至下了病危通知，而师母又骶骨骨折，不得不卧床在家，但她心又在先生那里，晚上经常整夜睡不着觉。看着躺在用帘子隔起来的病床上、胸口的各种贴片连着各种生命体征监测仪和鼻孔插着吸氧管的老师，看着憔悴悲伤的师母，看着虽然坚强但毕竟年少从未经历过如此重大变故的琬洁，我的心一次又一次地痛起来。留下来，陪护先生，成为我唯一的选择。

但我的决定，师母没有同意。毕竟，我的儿子尚年幼，读小学三年级，爱人在外地工作又不在家，孩子怎么办？不过，在我看来，孩子虽然年幼，但各种经历对他也是一种成长。后来得知我回上海已经安排好朋友照看孩子，爱人也支持时，师母也就没说什么。非常感谢师母的容许，陪护先生的三天，让我更近地走近他，也让我更深刻地体会他的快乐与痛苦，

定格成我对先生永远的记忆。

那天到南京，师母一定要我先去家里吃饭休息一下。遵照她的要求，吃完饭后我到医院，那时候午饭稍过，病房里静悄悄，关着灯，我蹑手蹑脚走进去，先生却是醒的。等我稍微清洗灰尘完毕，屋子里的灯已打开了。先生不停地让琬洁为我做这做那，像待客似的。琬洁交代了陪护先生的注意事项后，离开。之后，先生的话闸子打开了，高兴地和我聊这聊那，一开始我担心他话说得多吃不消，但看他这么高兴，也就放松与先生聊起来，聊得开心处先生大笑，护工过来说有些日子没看到先生这样笑了，但也责怪他说得太多了。晚上，先生让护工给我铺开琬洁用的被子，几次让护工来替我把被子重新铺一下，免得我受凉，似乎是一个宠爱妹妹的长兄。这一切，让我觉得先生离可怕的病魔那么远。

但那天晚上的情形，让我感受到先生病得厉害。傍晚的时候，先生让护工给他加被子。到了晚上，先生不太爱说话了，我给他量了下体温。糟糕！已经超过 38.5℃，我有点慌神，一边不停地给先生喝水，去找护士，一边用短信向师母汇报。师母急得不行，要和琬洁马上赶过来。但那时候已近深夜，慌乱中我安慰她，医生在这边，没说什么危险的话。说实话，我那时俨然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给先生喝水，不仅仅是让先生补充体液，也怕他睡着了，不停地进进出出去护士站拿冰袋给先生敷上，不停地要求护士找医生来，也不停地向师母汇报先生的情况。好在情况最终稳定下来，先生在体温攀升到 39℃ 多之后出了一身汗，体温下降，险情终于过去。

但那天晚上的情况，却让师母心急如焚，我的每一条短信，都扯着她的心。在先生体温攀升的时间里，她给我电话的时候，语气都变得不稳定了，以前干练的她，变得慌乱无助；我似乎又看见她发短信的手，就如她收到医生病危通知签字的要求时候一样，不知道往哪里按键。这一刻，我的心生疼生疼，她已经经历了多少次这样的恐慌啊，还会经受多少次？所以，此后的两天里，虽然先生也有发烧，但因为有了第一次的经验，我都能比较沉着地应对，不再急着告诉她。

我在医院的第二天下午，师母终究还是不放心跑过来，拖着骶骨骨伤。先生看师母过来，怜惜地问：“你怎么又过来了？你的骨伤又未好。”师母宽慰他，“我在床边的椅子上躺着，我不坐起来，就看着你”。但她怎么可能只躺着呢？师母还是做到先生的床边，抓起先生的手，抚摸着。在那个时刻，我能深切地体会先生内心的痛，也是他后来不止一次地跟我说的话：“我对不住吴老师和琬洁，琬洁还小。其实最对不住的人是吴老师，留下她，不能白首偕老”。

但陪护先生的日子，也有快乐。师母和琬洁来的那天下午，他们一家三口团聚在病房里，互相“揭发”和回忆以前的种种“罪状”，特别是琬洁成长过程中的很多趣事，病房里充满了笑声，多么温馨的时刻啊：父慈母爱，孩子明理懂事。在最艰难的时候，都用最快乐的表情去面对彼此，多希望时光停留，这一刻永存。

陪护先生的三天，也是和先生聊天最多的日子。先生被病痛折磨的时候，我焦急不安，也坐立不安，只能尽可能地用我能想到的一些办法试图去缓解。当然，我没有多少医学方面的知识，束手无策的时候就跑去找护士。但有时先生不让我去找，说找多了会给护士添麻烦。先生为了不让我太担心，病痛稍微缓解和轻松些，就和我聊天。每次我俩聊天时，他对自己的病情谈得很少，谈得最多的是生活，是孩子的教育，以及学术圈子里的人和事情。他嘱咐我要在事业与家庭之间取得平衡，若不能的话，天平要向孩子倾斜。当然，偶尔也有感慨，病来得太突然，很多事情还来不及做。他这一生，大多顺利，事业上成名早，家庭生活和谐，与师母感情甚好，女儿孝顺懂事，又很有出息，不仅在高中时获得格林奈尔文理学院的全额奖学金前去读本科，而且又以出色的成绩被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提前录取，将前去攻读法学博士学位（JD），颇感欣慰。还有一件让他欣慰的事情，就是他所有的学生都留在了教育系统，没有人去经商。但最大的心事还是走得太早了，留下师母和琬洁。

先生那时对自己已有充分的心里准备，但他从来不说，怕师母太伤心。有次他跟我聊天，说“我的病是在7月4日查出来的，我搞美国研究，吴老师担心我会在7月4日走，那是美国的独立日。”为了让师母放心，他在病痛发作的时候，既想她，但又不忍她过来，而我也不能让师母经受太多的恐慌。后来两晚先生病痛发作的时候，我们都采取事后报平安的方式：“刚才……已……不要担心”。但其实，他们彼此怎么能不担心呢？对于一辈子生活在一起的“神仙伴侣”，用他的话说“长到一起”的吴老师，他怎么能放下呢？正因为如此，先生才会在4月底发短信给师母，叮嘱她：“亲爱的，不要难过。要有勇气面对。虽然我要走了，但你的生活还有精彩！”

3月30日，也是周五，因为下午有硕士招生面试，我需要在上午赶回去，我爱人给我订了早晨九点钟的车票。那天早晨，先生显得精神比平常好，早早就坐在床上，用护工递过来的毛巾擦了脸，还刷了牙。那时候，刷牙对先生来说是一件不容易、较痛苦的事情，因为会引发呕吐。不仅如此，先生还有了吃东西的欲望，让琬洁过来的时候在路上买他喜欢的面包。所以，那天早晨先生也吃了早饭，胃口不错。要知道，吃东西对先生来说也是很痛苦的，因为药物的缘故，很多时候吃下去就会吐出来。这让我满心欢喜。

然而，先生是清楚的，流露出无限的惜别之情。他不仅洗漱干净，吃下早饭，将自己最好的状态留给我，而且下床坐在椅子上，亲自在送给我的每本书上写下对我的祝福、嘱咐和希望。当然，在我提出要出发去火车站之前，他一直是很理性的。但是，当我准备出发，他的眼泪出来了。他觉得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拥抱着先生，我也泪如雨下。轻轻地贴着先生的额头，拭去他的眼泪，我收拾着行李。这时候，查房的医生们进来了。嘈杂的人声响起，先生睁开眼睛，抬起头，第一反应仍然是看向站在医生侧边里的我。这一幕，无数次在我的脑海里浮现，让我不能自己，潸然泪下。人生难以预见，我那时真的觉得我们肯定会

再次见面，但谁知道竟是永别？！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有无数驿站。先生走了，启程去了另一个世界。他曾说过，“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样子”。我猜想他定去了天堂，那里没有病痛，没有离别，有他爱看的书，还有他的老师杨生茂老先生。

先生的追悼会在五月四日，而这一天恰好是他自己的生日和杨老先生的忌日，这是不是冥冥中的巧合？

先生这一生，纯净如水，顺利如水，正直如松。人生做到如此，虽然短暂，但已足够。

恩师，祝福您在天堂快乐！

忆恩师任东来教授

孙 倩

2013年5月2日，任老师走了。离开了吴耘老师和琬洁，离开了他未竟的学术事业，离开了敬他、爱他的学生们，留给我们无限的哀思。

任老师走时，我身在印度，没能回去送老师最后一程。这些天来，老师的音容笑貌一直萦绕在脑海，挥之不去。总想写点什么，思来想去，觉得老师的学术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学界以及师兄师姐们都已给了肯定和总结。作为小硕毕业的我，就学习与生活中的点滴，写点我心目中的任老师吧。

我是2001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跟随读任老师读研究生，同门是翟艳芳和胡晓进。因为自己本科毕业于一所普通大学，再加上本来读书就不多，进入南大这样的顶尖学府，导师又这么优秀，所以一直忐忑不安。记得任老师和我们三个第一次谈话时，就对我们说：“我不指望你们将来都成为历史学家，但在这里读书的三年一定要认认真真。”老师的一番话令我不安的心稍稍宽慰了些，当时自己心里就发誓一定不让老师失望。

老师为人爽直豁达、热情真诚。作为知名教授，他从不端老师的架子。无论是课堂上还是老师的办公室里总能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当时我们每个月都会去他办公室聊读书心得，其实每次去的不止我们三个。国际关系史专业的李潇、施蕾，世界史专业的罗珊珍也都慕名前往。不管是不是任老师的学生，只要是去请教问题，老师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老师那堆满书的、略显局促的办公室也成为我们的精神乐园，至今仍然怀念。

老师鼓励我们多读书，记得他曾经说过：“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但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选择自己的教育，之后选择自己的婚姻。人生的后半段就会不同了。”或许这就是对“知

识改变命运”的详细注解。如今亦为人师的我曾无数次在课堂上向我的学生转述这句话，激励学生、也在勉励自己。

在我们读书期间，老师的研究兴趣已经转向美国宪政。胡晓进和翟艳芳都跟随老师的脚步，投入到了对美国宪政的研究，而我却对美国的公益事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老师非常尊重我的选择，逐字逐句地帮我修改文章，并推荐发表。毕业后老师依然把他最新的文章发到我们的邮箱，勉励我们不要中断学习。

老师对学生学习上要求严格，生活上也很关心。2002年元旦，老师请我们去他家里做客，在向我们发出邀约时，他一再叮嘱：“‘君子之交淡如水’，你们还是学生，没有收入，所以千万不要带礼物。”记得当时一起在老师家做客的还有历史系刘成老师一家。在当时并不宽敞的客厅里，大家海阔天空、相谈甚欢。席间，吴耘老师对我们说：“你们导师让我多准备些肉食，因为你们食堂里的菜没什么油水。”写到这里，我已不能自己，泪水夺眶而出，多么善解人意的老师啊！

记得毕业前夕，最后一次去老师办公室，他对我和翟艳芳语重心长地说：“女孩子最大的事业是家庭。”这句话我一直铭刻在心，并一直身体力行着。在老师病重期间我去看望他时，我再度提起。对于8年前的这句话，老师可能已经记忆模糊了，但我知道因为吴老师为家庭的辛勤付出，才有了老师对学术的全身心投入，才有了这些为人称道的成就。老师这句话是对吴老师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鼓励。说到这里，其实我的小红家庭的组建还要感谢任老师，他在无意中做了一次成功的“红娘”。

2002年暑假，老师推荐我去清华大学参加第一届军备控制讲习班，在班上我认识了一位来自复旦大学的博士生，现在他是我的丈夫。任老师知道后很开心，当时他还开玩笑说：“南京人有个习俗，新婚夫妇要为媒人送皮鞋，因为媒人两边奔走把鞋子都跑坏了嘛！”老师无心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2005年春天的一个周末，我带学生去南京参加社会实践，趁学生中午吃饭的空，我赶到新街口的大洋百货想为老师选双皮鞋。因为不知老师的鞋码又怕直接问会被老师拒绝，犹豫再三还是把电话打到家里，正好琬洁在，老师不在，真是天助我也！我让琬洁看一下爸爸的鞋码，至今还记得琬洁稚气的声音告诉我“20.5”。我选了双自认为舒服的鞋子，把它放在了师妹蒋阿凡那里，请她转交给老师。因为我晚上要带学生住到浦口去，实在走不开，就没有亲手把鞋子交给“红娘”。如今想来真是遗憾啊！

老师走后，从师母吴老师处得知，我送老师的那双皮鞋，老师格外珍惜，穿得鞋底都变薄了也舍不得丢掉，而是经常在开车的时候穿。多年过去，期间老师又搬过家，师母几次整理鞋柜，想淘汰一批穿旧的皮鞋，但我送的这双鞋老师从不让送人。老师说因为这双鞋包含着学生浓浓的情意！写到这里，泪水已经打湿了键盘。因为感动，没想到老师会这么珍视学生送的小礼物。也因为自责，这么多年来，总觉得自己算不上老师的得意门生，羞于去见导

师。总在做自欺欺人之想“也许老师都不记得我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装在老师的心里，何曾忘却。其实老师要的，不是我们都成为历史学家，而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其实南京离上海很近，去看望老师很容易，但太多的顾虑、杂事的牵绊，阻挡了我去看望老师的脚步。

毕业9年来，虽然经常在教师节会给老师打电话问候一下，与老师见面却只有两次。

一次是2008年冬天，老师应邀到复旦大学历史系做讲座。我爱人看到了海报告诉我，我闻讯赶去，想请老师吃个晚饭。但由于老师讲得太投入忘记了时间，回程的火车票也已买好，时间来不及了，吃饭只好作罢。我们一家三口以及复旦历史系的一位博士生（抱歉记不起名字了）随老师边走边聊，到他下榻的复旦卿云楼收拾行李。老师非常关心我的学业，问我继续读博士没有，我很惭愧，只推脱等孩子大一点再说吧。老师知道在上海的生活不容易，问起我们的收入、生活情况。其实老师不只是活在学术的云端，他也非常接地气呢！说话间，他脱下大衣，穿上毛衣，结果毛衣还穿反了。我不禁想起吴老师曾提过任老师在生活上是不拘小节的，老师其实是很可爱的！

第二次见老师是在2012年的12月15号，老师生病已近半年，而我还被蒙在鼓里。一方面是老师叮嘱晓进等同学，不要向同学们张扬。另一方面，确实自己与老师的联系太少了。得知老师生病，还是因为我爱人带复旦的学生去南大中美中心交流，才知道老师在住院。当天早上8点多，我爱人电话告诉我任老师生病了，我以为不是什么重病，就给老师打个电话问候一下，电话那头传来老师一如既往的爽朗笑声，轻描淡写地说：“没关系，我已经做过两次化疗、一次放疗了。现在情况很好，真的没事，你们都不用担心。”听到这句话，我的心里真是五味杂陈，震惊、怀疑、伤心、自责……一齐涌上心头，冷静下来后，对老师的钦佩又多了一层，真的想不到这么轻松的话语出自一个重症患者之口。

下午两点我赶到南京军区总院，轻轻地敲了两下病房的门。吴老师开的门，当时任老师在睡觉，被我吵醒了，隔着帘子问：“是孙倩吗？”时隔四年，再次见到老师，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年轻、朝气蓬勃，真的无法把他和癌症患者联系在一起。老师又问起我是否读博的事情，我说我都无地自容了，真是朽木不可雕也。

我们聊到老师的学生们，任老师的学生中选择做教师的人很多，这或多或少是受到老师的影响。记得在南大读书时，我们这些研究生私下总爱评论下老师。任老师和吴老师（吴老师教我们英文）这一对才子佳人，经常成为我们话题的焦点。他们琴瑟和谐、夫唱妇随；他们思想独立、正直单纯；他们不为五斗米折腰，是真正的读书人！这种精神贵族的生活令我们羡慕不已，毕业后我们也选择了相似的生活方式。我们很多人不但自己做了教师，也选择了做教师的另一半。老师对我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正如那丝丝缕缕的春雨，于无声中滋润了万物，影响了我们的人生啊！

我们聊到琬洁，琬洁这孩子积极进取、阳光单纯，充满了正能量。在美国读书，门门功课都是 A，还在练习芭蕾舞和小提琴，已被哥大法学院录取。琬洁要求自己“每件事都要做到最好”。这句话我讲给正在读小学一年级的我女儿听，她非常佩服琬洁姐姐，把琬洁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琬洁小小年纪已经有了铁杆粉丝了！

这次见面我们聊了半个小时，怕影响老师休息，也确实打扰了同病房的另一位病友，我与任老师和吴老师匆匆告别。第二天中午任老师发来短信，大意是感谢我去看他。任老师就是这样的人：他百分百为学生付出、但绝不求学生回报！

2013 年 2 月 27 号，我随丈夫赴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工作。临行前，我给老师发短信说我们一家要去印度了，希望他和吴老师有机会能来印度旅游。我的邀请是真诚的，我真的认为老师的生命能够延续更长的时间，因为两个月前见到的他是那么的神采飞扬。老师回信说：“真羡慕你们，可以体验不同的生活。祝你们印度之行顺利。”这句话，成为老师与我之间最后的沟通。5 月 2 号老师就匆匆告别了人世。

其实还有许多话没来得及对老师说：您对学术孜孜以求、诲人不倦的精神，您宽以待人、热情真诚的品质一直深深激励、影响着我們。您面对病魔时的乐观与豁达，又为我们上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课，您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灯塔。

祝愿在天国的您平安、喜乐。

忆任东来老师

罗珊珍

2001-2004 年间我是南大历史系世界史专业的硕士生，主修英国史，选定的导师并非任老师。上周和之前的导师陈晓律见面，我们还回忆起任老师，他谈起了任老师在 90 年代时为其他历史系老师谋取了“小福利”，托他的福，我导师偶尔可在酷暑天气中躲进中美中心吹吹空调。

我曾经在 2001 年（研一）和 2002 年（研二）（应该出入不大）期间选修了任老师的两门课（一门必修，一门选修）。他那时编制在南京大学与霍普金斯大学联合办学的中美中心，但仍兼着南大历史系的教学。虽然大部分时候他不在历史系内坐班，但学生们都知晓他，开朗，帅气，有时当然也带着小小的傲气。后来从他课上的自述与表现，印证了当时的传言。也许他真的是天之骄子，人生和学术道路比起他高考同届的同学要顺遂多，但我更对他的勤奋有印象：虽无硬性要求，他一定每个工作日到中心上班。

与传统的教条及照本宣科教学不同，他采纳的是美式的上课方式，在中美中心这是常态，但对于南大历史系的学生确属头一遭。鼓励学生阅读英文原版的史料和著作，认为熟练掌握原文资料是毋庸置疑的基本功，作业则是要求学生基于自选的材料写 essay，强调学生有原创性，有自己新观点。同时热情地要求学生有问题随时问，而他确实做到了每问必答。我也许不是他那门课中最好的学生，但可能是最有好奇心的那个。有时我问出些武断或幼稚的问题，他总是鼓励、引导和解释，正是这种恰当的回答给我很大的信心，让我学习到也开始享受独立思考，对美国近现代史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之后我虽然未从事历史研究工作，但他给我的能量帮助我之后在美国的求学适应得更快，这是后话）。我总是很认真地阅读，写论文，有一次他特意点出我的小论文，在课上公开赞扬，说我的观点不落俗套，那种心里的小小“骄傲”我现在还记得。

相信他那时是真的欣赏我，认为我是可造之才。很快，他邀我和他自己的两位硕士研究生一起帮他翻译一本英文原著。在我看来，这是很大的鼓励，通常老师间是不会跨界找学生帮忙的。他给大家布置了任务，规划了时间表，一个暑假过去，我还是没动笔，每翻一句话就想站起来偷懒做别的。“拖延症”和受限于能力，我只能一拖再拖。到了最后关口，应付差事那样把翻译稿交上去，怯怯地等。等来任老师的回复（忘了是邮件或电话），很严厉的批评，直接点出稿件质量非常差，让他不得不全部返工。令我更羞愧的是，在给他增加了无数的工作量后，出版时，他仍然让列我为译者。我那时尴尬难当，不知道如何应对这样的状况，很多时间想道歉，但终究还是敌不过自己的薄面皮，觉得开不了口，唯有见他就躲。

后来临毕业，他还是我硕士论文的答辩老师，虽然自我感觉写得不好，他还是轻轻地放过我，给我提出恰当的修改意见。毕业之后也就慢慢散了，一来忙于生计，二来脱离了本专业，但一直想好好地写信给他，念念旧，懒着懒着，总觉得未来会有时间，终究把最后的机会也懒过去了，徒留遗憾。

怀文抱质彬彬君子——任东来先生的为学与为师

胡晓进

恩师任东来先生病逝后，学界的悼念、缅怀文章源源不断地涌现于网络、报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网站”、“学术批评网”、“学术交流网”开有专栏，5月4日的《新京报》、《东方早报》辟有专版，《北京青年报》、《扬子晚报》、《现代快报》、《法制日报》、《云南政协报》、财新《新世纪》、《深圳特区报》、《民主与法制时报》或发表专题新闻、或刊发回忆文章，悼

念这位英年早逝的学者，《中国青年报》、《美国研究》、《云梦学刊》、《社会科学论坛》、《法学家茶座》等报刊、杂志也推出专题纪念文章。任东来先生一介书生，终身以书斋、文字为伴，从未承担任何行政职务，为何能吸引如此众多媒体的目光，引起如此持久的悼念。我想，这其中自有缘由。这些报纸的编辑、记者，基本上都没有见过先生本人，但几乎都知道或者读过他的书，领略过其学术旨趣与学术魅力；写作悼念文章的学界师友，与先生都有或长或短的接触，亲身感受过他的为人处事之道，了解其个人品格，钦佩其人格魅力。也许，正是因为他独有的学术旨趣与学术魅力，超群的个人品格与人格魅力，吸引着读者、感染了师友，让他们唏嘘感慨、扼腕叹息。

我是先生指导过的学生，自 2001 年始跟随先生学习美国历史，前后凡六年；2007 年参加工作后，又在先生的指导下写作、译书，前后也有六个春秋。师门十二载，由于生性笃钝，至今尚不能登堂入室、窥见堂奥，只能就我所了解的侧面，从一个学生的角度，谈谈先生的为学与为师。

一、将学术融入生命

任东来先生是我所见过的最有激情、最具天赋、最为敏锐的学者，他对一切新鲜的学术资讯都抱有浓厚的兴趣，能以极快的速度把握其核心内容，然后简明扼要地表达出来；其思想之活跃、思维之敏捷、思路之清晰，常常令我钦佩不已。他对学术问题，似乎有与生俱来的热情、领悟力与理解力，学术完全成为其生命的一部分。

孔子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对于学术问题，任东来先生不仅是“好之者”，而且是典型的“乐之者”，是真正以学术为志业、以学术为乐的人。他出身大学教师家庭，从小就显示出读书、写作的天赋，小学时作文常被当做范文在班上宣读；在宁波读中学期间，就办了当地图书馆的借书证，经常借阅课外书籍。1978 年进入大学后，班上不少同学是“饱学之士”，或通古代文史，或懂近代学问，或精马列经典；他自谦是白丁一个，只好恶补苦读、埋头追赶。“大学高年级时，一套出自美国名记者威廉·曼切斯特的《光荣与梦想》，给我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原来一个国家可以如此多元而不至于解体，一个社会可以如此多样且可以繁荣发展，一个民族可以如此混杂却不至于四分五裂。由此，这样的感慨便引导我走上了美国研究的学术道路。”此后，经过丁则民、杨生茂、冯承柏等老一辈先生的指点，他的学术视野日渐宽广、学术兴趣日趋浓厚，在中美关系史与国际关系理论两个领域，取得了不俗的研究成绩，也体会到了学术世界里的无限乐趣。2000 年前后，他的研究兴趣又转向美国宪政史，先后与几位同道合作完成了《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 25 个司法大案》、《在宪政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最有权势的法院：美国最高法院研究》等专著，还自己动手、指导学生翻译了这个领域的一系列著作，包括《美国最高法院》、《风暴眼：

美国政治中的最高法院》、《反对有理：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的著名异议》、《最民主的部门：美国最高法院的贡献》。完成每一部著作，几乎都是一次愉快的学术之旅。

任东来先生很享受读书、写作带来的乐趣，在学术日益组织化、团队化的时代，他不属于任何研究基地、重点学科，也不是任何类型的杰出人才、学术带头人，甚至连培养对象都算不上。但他以一己之力，完全凭自己的兴趣，在中美关系史、国际关系理论、美国宪政史等几个领域，都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这其中，也离不开他敏锐的学术洞察力。

任东来先生具有捕捉学术热点的超凡直觉与能力，他几次学术转型，都能占领甚至是引领学术前沿。研究生期间，他的学术训练集中于美国外交史与中美关系史，尤其是抗战期间美国对华援助。工作以后，他的学术兴趣扩展到当代的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写作了中美最惠国待遇问题由来、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问题等论文，后者被誉为国际关系研究中采用比较分析方法的范例。这些论文敏锐地捕捉到了1990年代中美关系中的热点，从历史与比较的角度澄清了当时知识界的一些误解。与此同时，他还率先将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霸权稳定论”以及与之相应的国际制度理论，准确地介绍给国内学界，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此外，他还在国内较早地介绍、分析了美国的族性（Ethnicity）政治与肯定性行动争议。这些，无不体现了他敏锐的学术洞察力。

当然，任东来先生最精彩的学术转型当数从美国外交与国际关系，转向美国宪政。大约在2000年前后，他开始了在美国宪政史领域的探索与冒险，并从此迷上了这一全新的学术天地。2004年初，《美国宪政历程》出版后，大受学界欢迎，很快再版，并被制作成有声读物，广为传布。贺卫方教授称，“本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通过联邦最高法院在过去两百余年25个重大案件的审判的再现，向读者展示了一部形象的美国宪法史。这幅历史图画在细节的刻画上栩栩如生，而评论则从大处着眼，要言不烦，对于相关制度演进的过程及其历史和现实的意蕴给予了深刻的揭示。”我在给中国政法大学的本科生讲授《美国宪政史》课程时，班上的学生也不止一次地告诉我，任东来老师的《美国宪政历程》是他们了解美国宪法历史的人门读物，读起来很“过瘾”。

在任东来先生转向美国宪政时，这一领域还只有留美的张千帆教授、王希教授等不多的几位开拓者，国内学界对美国宪政的关注，远不如今天这般热切。但是，任东来先生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极有学术潜力、乃至学术市场的领域，值得全心投入。时间证明，他的预感是对的。在某种程度上，《美国宪政历程》已经被视为先生的代表作和化身，成为中国学界了解美国宪政的一个窗口，也是众多媒体记者追思、缅怀先生的一个契因。

在美国宪政研究领域，任东来先生从未停止探索的脚步，司法审查、堕胎权等重大问题，都曾留下他的研究印迹。但最令人惊讶的还是他对持枪权问题的关注，2008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个人有权持枪后，他立即意识到，美国宪法争议与“文化战争”出现新动向，随即与自己

指导的学生就持枪权问题的宪法解释展开研究。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再次表示，持枪权是一种不受各级政府侵犯的个人宪法权利，印证了他的直觉与学术眼光。实际上早在2002年，在讨论《武装美国》这部有争议的获奖著作时，他就察觉到，持枪权与堕胎权一样，是美国“文化战争”、宪政分歧的根源。

在其厚重的学术人生中，除了浓厚的学术兴趣、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外，任东来先生还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之所以从中美关系史转向美国宪政史，很大程度上也是觉得宪政对于国家治理、公民权利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他曾谈到，中国人讲宪法已近百年，却不知晓宪法的本义在于限制政府、约束官员和保护公民。在他看来，历史上有宪法而无宪政的国家有之，无宪法而有宪政的国家亦有之，而美国则是既有宪法也有宪政的国家；美国的经验表明，宪法的意义在于转化为宪政，施行宪政的关键则不在于宪法条文有多完美，而取决于制度、文化和人。因此，他在研究美国宪政史时，关注的重点不是纸上的宪法条文，而是宪法如何在复杂的社会政治语境中被人诠释和运用。”在李剑鸣教授看来，“任东来教授的现实关怀，同样体现在他对美国和国际政治中的热点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他经常以快速的反应、灵动的文笔和不俗的见解写作时评，发表在许多报纸和刊物上，让人领略了一个史家看待当前世界的方式。”“此外，任东来教授还关注国际国内的学术动向，满怀热情地参与了学术规范和学风建设的讨论。他在20世纪90年代发表数篇文章，介绍欧美学术规范，批评国内学术现状，倡导规范、公正和严谨的学风。在国内学术的规范化进程中，这些文章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二、“功夫在诗外”

任东来先生口才出众，讲话节奏分明，抑扬顿挫，不时爽朗大笑，兴之所至，甚至会拍大腿。听他讲话，可以说是一种享受，作为弟子，我们都很乐意跟他聊天，但是必须给他提供新鲜信息，激起他的谈话欲望。

谈话，是他表达学术观点的重要形式，也是指导学生的一种方式。读书期间，只要他在国内，我几乎每周都有机会听他讲故事、发议论，有时是在课堂上，有时是在他办公室，有时是在饭桌上。或是因为一篇文章、一本书，或是因为某个人、某件事，只要与美国历史相关，他都能信手拈来，谈上半小时。他讲话极有条理，思路清晰、重点突出，绝不绕弯子，让人一听就懂。他的办公室永远向学生敞开着，没课的时候，他一般都在，我们如果想过去找他，事先打个电话说一声就行。不管是不是他自己指导的学生，只要是请教问题、或是与读书写作相关的事，他都乐意回答，愿意帮忙。

任东来先生讲课、写作，都有一定的故事性和趣味性，他也曾经跟我们讲，历史应该是一门有趣的学问，好的历史学家都是讲故事的高手，《美国宪政历程》集中体现了他的这种追

求。他希望“熔学术著述的准确性和通俗读物的可读性于一体。既要有基本制度的介绍，又要有人物的活动；既要有宏观历史的观照，又要有具体的情节，甚至是悬念”。为此，他和陈伟老师确定了三个写作原则：“第一，以案说法，法在案中；第二，以事说理，理在事中；第三，词章并茂，雅俗共赏。当然，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的主题，那就是，从纸面上的宪法文本，到现实中的宪政制度和生活中的宪法诉讼，是一个漫长的进程。美国的法治建设，不仅仅有赖于那些法律精英：法官、律师、立法者和执法者，而且还离不开无数的芸芸众生、那些被压迫者、被歧视者、甚至是罪犯为自己宪法权利的苦苦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一部美国的宪法史，正是这些勇敢的小人物不懈地争取自己权利和寻求社会正义的历史”。

《美国宪政历程》讲述了二十五个宪法故事，已经成为中国读者了解美国宪法的必读书籍。但是，任东来先生的故事还没讲完。他沿着案例之路，追根溯源，又将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故事讲了一遍。作为后续姊妹篇，《在宪政舞台上：美国最高法院的历史轨迹》延续了《美国宪政历程》的基本风格，只不过更具有系统性，从早期的司法实践一直讲到2005年最高法院的人事更迭，兼顾法院自身传统与外部政治环境，详略得当，要言不烦。如果说《美国宪政历程》是案例史，是以案说法的案例故事，那么《在宪政舞台上》则是制度史，从法院角度解释美国宪政，讲述最高法院的司法历史。在写作这两部书之时，缔造司法历史、撰写伟大判决的大法官，也随之进入了任东来先生的研究视野。早在出版最高法院制度史时，他就预告自己将接着讲述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故事，以《美国宪政守护者》为名，讲述十位杰出大法官的司法人生。目前，书稿基本成型，与前两部共同组成“美国宪政三部曲”，有事件、有人物，还有制度，自成一体。

与他在中美关系史领域的研究成果相比，任东来先生的美国宪政史研究，并没有太多的学术深度。他自己也说，“我基本没有办法做出像中美关系史研究中那样原创性的成果，我只能在国内学术参照系中做到最好，同时尽可能争取更多的读者，让他们分享美国的法治经验。”于是，他放弃学术的深度，转而追求学术的广度与社会价值，结果大获成功，广受欢迎。

学术的深度与广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要有深度，必须有一定广度。任东来先生多次用老农种树的故事来比喻两者之间的关系，这个故事是他从比较法学家沈宗灵老先生那里听来的。“先生告诉我，在乡下劳动时，他特别注意到老乡种树的经过。根据树的大小，农民先大概画一个圈，挖一个坑，然后，把树放进去试一试。不够深的话，继续往下挖，这时候往往会发现，原来的口子太小，深不下去；然后，再加大口子，这样才能够继续深入，几经反复，一个树坑才挖好，能够与要种的树完美契合。从农民的种树中，他悟出了做学问中‘博与约’的关系，没有一定的博，就不可能达到相当的约。这是一个不断自我意识、自我调整的过程”。沈先生的这段比喻，让他“恍然大悟，终生受益，而且后来不断向自己的学生转述”。任东来先生的导师杨生茂老先生，也非常重视博与约（即通与专）的关系，他一直强调，研

究美国历史，更应注意博与通的问题，“应在博的基础上求约，在通的基础上求专”。

任东来先生自己就是一个知识广博、见闻丰富的人，他经常对我们讲，读书、写作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各方面的知识、理论都要涉猎；做学问，就像学作诗一样，“功夫在诗外”。他主张多选修其他专业课程、多听名师讲座。1986-1987年，他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学习期间，特意选修了“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比较现代化”等新课程，而不是自己原本已经十分了解的中美关系和美国外交方面的课程。

在日后指导学生的过程中，他也一再鼓励自己的学生选修其他专业、甚至是其他学科的课程，多吸收、借鉴其他领域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手段。就我个人而言，在硕士研究生阶段，除了修读任老师和历史系其他老师的课程外，还到法学院选修和旁听了几门课程，深刻感受到历史学与法学的不同视角和研究路径。针对同一个宪法条款，两者的思考方式截然不同：如果说历史学以线性推导为主，强调前因后果，法学则以平面扩散见长，注重理论分析。

除了常规指导之外，任东来先生还积极推荐自己的学生参加各种暑期讲习班，增长知识、开阔眼界。在我印象中，他推荐学生参加的暑期班包括：国际安全讲习班、军备控制暑期班、国际关系研究方法讲习班、世界史研究生精品课程班、世界宪政暑期讲习班，等等。

任东来先生的本行和研究领域虽然集中于美国历史，但他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却在中国。他一直强调，学习外国历史，必须以中国历史为参照。他曾推荐我们阅读李剑鸣老师的文章《本土资源与外国史研究》，认为“这是一篇非常好的文章，告诉我们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外国史研究者，为什么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在他给学生所开列的书单里，有三本书中国历史方面的书是必读的：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第一册）、王亚南先生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和陈旭麓先生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其中，《古史辨》对他的影响最大，顾先生在《古史辨·自序》中提出，学问“只当问真与不真，不当问用与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任东来先生因此坚定了自己作为学者的职业目标：“为学术而学术”！学问的“真”求出来了，自然会有人去“用”，但这“用”是别人的事，而不是学者的责任。

求真就必须从史实出发，不讲空话；必须沉下心来，甘愿坐冷板凳、坚守书斋，追求《桃花源记》中“武陵人”的境界：“缘溪行，忘路之远近”。我们都是学术河流里的渔人，但是能发现“桃花源”的人却是凤毛麟角。我想，在学术世界里，任东来先生也许找到了自己的“桃花源”。

三、爱写作也爱生活

任东来先生是一个待人真诚、热情、心无城府的人，从来不愿以恶意揣测别人。他对学生，批评时严厉，指导、帮助时却竭尽全力、毫无保留。学生的每一封邮件，他都会及时回

复；学生给他的每一篇文章，他都会逐句修改，提出具体建议，反复多次，直到他认为合适，才会推荐发表。刚进师门时，我的第一篇习作，被他修改了不下五遍。后来在他指导下翻译英文著作时，他也是仔细对照，每行必改。他常常对我们讲，文章不厌千遍改，好文章都是改出来的；修改文章是学术训练的一个重要环节，与上课、读书同等重要。对于实在是改不下去、自己又不满意的文章，可以先放一放，以后发现新材料、有了新想法，再补充完善。他对自己的文章也是如此。1984年读硕士时，他曾写一篇关于美国历史上联邦法令废止权问题的习作，一直搁在书橱里，直到2001年才修改发表，距离该文最初完成时间整整17年！

2002年前后，任东来先生开始在报纸上开设国际评论专栏，以生动的笔调、敏锐的眼光、独特的视角，介绍、分析世界时事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意义。他将写评论视为学者服务社会的一种形式。他也希望我们勤写作、多练笔，“对书本的知识和现实的世界永远保持探索的欲望，随时把自己的想法和看法记下来，持之以恒，一定会有收获。不论你们以后做什么，观察和写作能力永远是有用的”。

任东来先生非常强调书评的作用和价值，他常说，学者的本职工作就是读书，书读多了必有感想，把感想记下了，就是书评。但是写好书评并不容易，必须有学术史上的整体把握，必须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指明不足；惟其如此，方能裨益学界，推动学术进步。他不但指导学生写书评，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写作了大量颇有学术分量的书评，其中不乏有情有理的佳作，比如，他为《战后世界历史长编》所写的“墓志铭”——《纪念一项延续了四分之一世纪的学术事业》。

任东来先生学术视野宽广，学术交流广泛，多次担任国内美国史专业毕业生的论文评阅人或答辩委员，提出了不少中肯的修改意见。他还作为一些重要杂志的匿名评审人，评阅青年学者的论文，提供修改意见，指导、鼓励他们完善研究。在这些学生和后辈面前，他没有一点架子。无论是谁，只要是跟他讨论学术问题，他都会热情回应，甚至掩饰不住兴奋之情。他是少有的对学术问题充满激情、永远好奇的学者。

也许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激情、这份好奇心，使他一直朝气蓬勃。在我的印象中，他似乎永远是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与我们之间并无时代隔阂。他几乎是学校最早使用电脑写作的历史学教授，也几乎是最习惯于用电子邮件跟学生联络的历史学教授。从他那儿，我不仅学到了写作、修改文章的方法，甚至学到了使用 Word 的一些技巧，比如修订文档、制作目录和索引等。

修改学生的论文、译作，需要占用大量的休息时间，但他从不抱怨，也不马虎，有时候甚至会跟我们调侃一番。2003年初，放寒假之前，他给我们发来邮件，催促我们上交《政治和命运》译稿：“诸位未来的翻译家们，年关快到了，地主老财要逼债了。请诸位在寒假之前，把译稿最后相互校对审读一遍后，发给我，并把原稿复印件给我，我利用寒假把它校好送走。

我会把你们的翻译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记下来，下学期找机会谈一下。”

在生活上，任东来先生也是个乐观开朗、极易相处的人，对新鲜事物同样充满好奇，并且乐于跟别人分享自己的快乐。记得2004年刚买车时，他开车带学生去郊游、野餐，在邮件中通知我们，“专车运送（附赠人身保险），要带‘特殊’朋友，请赶快报名，除了准备好心情和好胃口外，不需要带任何东西。”读书期间，只要有新生入学或是毕业生答辩，他必定请全体学生吃饭，学校附近的中西餐厅，几乎都留下了我们的欢声笑语。

任东来先生常对我们说，学美国史有个好处，能长寿。对此，我深信不疑，因为他的话太有根据了，美国史研究领域的几位老前辈，均得享高寿。1913年出生的刘绪贻先生、1915年出生的黄绍湘先生，已是百岁老人，至今康健；丁则民先生去世时82岁（1919年生），杨生茂先生去世时93岁（1917年生），1920年代出生的曹德谦、邓蜀生先生也已年届九旬。任东来先生跟上面的每一位老先生，几乎都有私交，从那些充满温情的回忆文章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重师恩、念旧情的人。我知道，数十年后的某一天，我也会写下回忆恩师的文字。但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一天竟然如此之快，让我猝不及防、来不及反应，不敢回忆，也不愿回忆。本以为“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谁知一年之内，阴阳相隔，永不得见，岂不痛哉！

失去的是我最珍重的良师益友——沉痛悼念恩师任东来

储昭根

2013年5月2日18点32分，得到任东来恩师在鼓楼医院病逝噩耗，一时间，顿感错愕，让我一下子失神了两三个小时，老师一幕幕的教诲重新浮现在自己的眼前，让我久久无法平静。

其实，我们得知任东来老师的生病是去年冬天。但是，任老师包括其太太吴耘老师坚决不让学生们去看望，甚至我们同年师从任老师的一个同门到南京了，任老师也拒绝让她探视。任老师当时自信，他相信他能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康复，到时大家再见面。我想，能在任老师康复时，以任老师的豪兴，同门来个大聚会也未尝不是件快乐的事。

但事情似乎并没有如所想的那样好转。我们从今年2月开始一直商量何时去看任老师，但吴耘老师依然是拒绝大家去。就这样一次次想起，却一次次地放下了。到3月份时，我已按捺不住性子了，反复思考了好多天，终于鼓起勇气，直接给任老师打电话！让我根本没有想到的是，任老师接到我的电话后豪情万丈，与正常人，与我在他健康时交流完全没有两样！我用一个陌生号码打给他，他一听就说：“我听出来，你是储昭根。”然后特别高兴地与我天

南海北就聊了起来。他说他很自豪我用自由主义观点从事研究与写作。居然他还记得我6年前就提出一些中国对朝鲜的新颖观点。其间，只是略带提到自己的病情。我也与他谈到，他是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千帆的公民宪政宣言上首批71名签字学者之一，国内外影响很大。他从不想当官，甚至对教育管理部门的领导岗位也没有任何欲望。但几年前，他在电话中很高兴告诉我，他通过民主选举当上了小区业主委员会主任了。他自豪地说尽管太忙，但是这是落实基层民主的实践！任老师从研究宪政到宪政健行者，这就是他的“宪政梦”！

我们谈得十分投机，但出于考虑老师有病在身，我不断提醒他，不能聊得太久。最后他自信地告诉我三月底时会出院，我于是与任老师就相约3月底时在南京见面。他最后还是高兴叫我故地重游，与老友们见面。我说主要是来看老师了，并安慰他到时我们在一起再多聊些时间。他很高兴说好才依依不舍地挂电话。

实在不忍打扰他。直到3月28日9时我才给任老师再发个短信：“任老师好，我们约好月底前来南京，不知病情可稳定了？……学生储昭根”。任老师中午11点32分时给我回复了一条很长的短信：“这周是生病半年来最痛苦的时期，白细胞低到危险水平，已经联系（续）发烧一周。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好意。但如果可以改变，最好推迟。”我们当然理解这种极其痛苦下的无奈，我只能再等。

接下来传来的是更多坏消息：除了高烧不断，南京军区总医院竟然以无法医治拒收。我们4月11日收到的是吴耘老师的消息：“各位同学，任老师病情加重，军区总院以无法救治为由拒绝接受他。（南大中美文化研究）中心黄老师竭尽全力，多方联系，仍无果。现在安排在南大校医院，因伤口很快就要烂到大动脉，琬洁拿了官方会诊到总院和鼓楼医院请护士会诊换药，不仅遭受冷脸，还遭拒绝。甚至拿了出诊费，不肯等出租掉头就走。中国的医疗制度真是让人寒心。”

一个名牌大学知名教授，在人生最后有限时光仍面对如此屈辱，面对如此惨淡现实。作为他的学生，我当然身同感受。我的第一个冲动是打电话给了中央驻江苏某内参负责人，希望他们关注下。同门商量包括吴老师的意见，任老师仍是他们会诊，不宜直接得罪他们。于是，我与任老师另一名在浙师大的博士胡美商量，我们不等任老师、吴老师同意了，直奔南京，哪怕是仅仅见一面。

为了给任老师最大的意外与快乐，我在网上折腾了深夜两点钟才订购了21朵康乃馨加百合的礼篮，并写上：“您的康复，就是我们的幸福；您的安康，就是我们的心愿。祝恩师早日重振雄风！于英红、胡美、储昭根、敬祝”若是任老师身体好时看到，高兴情形是我们所有认识任老师的人都可以想像的。后来去了才知，他已是无法再有欣赏花之心情与乐趣了。

4月13日凌晨5点立即起床乘高铁直奔南京。来到南京大学校医院时，任老师的病房贴上了：保持安静，拒绝探视！我们先只能从玻璃上遥望任老师在掉水并带上呼吸机。直到任